

史料选辑

第 三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史料选辑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我在南京解放前后参加农工民主党革命活动的回忆	章师明 (1)
解放前参加民盟南京市地方组织活动的一些回忆	李秉祥 (14)
我所经历的关于南京民联的建立和民革的建成	朱汉英 (26)
顾衡烈士在狱坚贞不屈的事迹	储子润 (38)
芦沟桥“七七”事变亲历记	洪大中 (40)
南京军校教导总队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	张文心 (55)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外交活动	李修业 (60)
大浪中的一朵小浪花 ——江苏省一女师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片断	刘 幸 朱 安 (72)
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储子润 (80)
我所了解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	邵仲香 (93)
昔日夫子庙的古玩商店	王源恩 俞宝书 (100)
我所知道的新奇芳阁清真茶社	李世富口述 杨为仁整理 (107)
北伐时期的南京无线电讯概况	吴勋如 (119)
蒋介石亲自掌握的密电码情报机构	丁绪曾 (124)

我在南京解放前后参加农工民主党 革命活动的回忆

章师明

我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上海市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介绍人是当时中国农工民主党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员会负责成员虞键和申葆文两同志，监誓人是当时农工民主党中央由香港派到上海来工作的农工民主党华东区特派员曾伟同志。曾伟同志既是农工党的老同志，也是当时中共南方局地下党员。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我在上海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在同济大学和进步同学一道参加当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暑假，我已读完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不久，农工民主党华东局某负责人（名字我记不清楚了）找我谈话，要我离开上海到江苏省扬州市为农工党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在那里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发展农工民主党成员。还要我等待时机，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与苏北解放区接上关系，以便从扬州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学习和工作，并运送药品及医疗器材支援解放区。为了有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农工民主党组织为我找到了一个社会职业，就是到扬州市平民中学去当教师。经过考虑，我觉得扬州这个地点很好，既靠近苏北解放区，又距上海不远，便于到农工民主党华东局请示汇报工作，于是就接受了组织的决定。我离开上海到扬州平民中学住了一

个星期，还未正式上课，有一天忽然接到同济大学工学院的通知，说中央交通部分配我到南京津浦铁路管理局工作，要我马上回学校领派令至南京浦口路局报到。去不去呢？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去吧，农工民主党要我在扬州活动；不去吧，自己感到学了五年机械工程理论和技术，若丢掉了，未免可惜。因此，我向校方请假一星期，回上海向曾伟和虞键同志陈述情况和理由，要求去南京铁路局工作。农工党组织研究后，认为我到国民党首都南京工作也好，可以给南京农工组织开展工作增加一份力量，于是同意了我的要求。一九四七年十月份，我离开扬州到了南京。从此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我以国民党交通部津浦铁路局实习生的社会职务为掩护，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在南京、安徽省一带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现根据我的回忆，写一点当时农工党部分活动和工作情况。事隔三十多年，难免有记忆不确之处，希望知情者阅后予以修正。

(一)

我到南京过了一段时间，就去找当时住在扬州路的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武思光同志，我对他说：“农工民主党华东局现要我在南京参加组织活动，请你分配任务和工作。”他对我说：“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到处都有特务，白色恐怖严重，你是章伯钧同志的儿子，如果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发现，更加危险，你暂时不要多活动，等待时机再说。”并说：“你以后不要多来找我，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高级军官，现闲居在南京，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都注意我，你常来不方便，以后有什么事我派人通知你好了。”我看他胆子较小，有

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去找他。

一九四一年暑假，我在四川考入当时设在宜宾李庄镇的同济大学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随李济深先生的包船“民联”号离开四川到南京，当时我父亲也由重庆乘飞机来到南京。我在南京住了一个月后，就去上海同济大学继续上学。我的父亲来南京后，住在鸡鸣寺兰家庄十五号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代表民盟参加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当时他认识一个小同乡名叫许耀洲，住在南京湖南路大同新村。我在南京期间，有一天，父亲叫我去许家，介绍我认识了许耀洲，并关照许今后多照顾我。因此，我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二次来南京，在找过武思光以后，就去找许耀洲，并告诉他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撕毁协议，国民党军队已大举进攻解放区了。我的父亲已离开上海去香港，我只身在南京津浦路局工作，请他多关怀照顾。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一口答应，并说：“以后如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我家房子也很宽敞，你从浦口过江来玩，可以在我家住宿。”当时，我喜出望外，心想在城里找了一个安身和活动的据点，对开展工作方便多了。从此我经常去他家，并且和他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搞得很熟，从而取得了他家的好感。来往一段时间以后，通过农工民主党上海组织的关系，我介绍他家的一些年青的亲戚朋友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借这个落脚点，积极开展农工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我认识的人们中间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展农工成员等等。

一九四八年夏季的一天，农工民主党华东局的虞键同志突然由上海来南京找我，同来的还有在伪中华海员总会上海市分会所属渔轮支部当干事的农工党老成员倪伟思同志。虞键当时

对我说：“农工民主党南京组织内部发现有个别坏人混入（据后来了解，就是加入农工民主党组织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关坤后），受到严重威胁，负责人武思光等打算离开南京，目前只剩下谭汉川一人进行个别接触，组织陷入瘫痪状态，所以农工民主党华东局决定派倪伟思同志以农工华东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南京视察党务。”并宣布：“经过农工华东局研究决定，对南京组织进行改组，重建市支部，由覃汉川（主任兼宣传）特派员倪伟思（兼组织）、章师明（青运兼工运）三人组成核心领导。”上海的虞键同志负责和南京农工组织的联系工作。委员还有朱静芳（女、负责妇运和民运）、燕非平（协助民运）、梁均超（参加青运）、阳昌明（参加民运）和杨坚（负责军运）等。当时根据农工南京组织的成员职业和单位分布情况，按照中共要求，确定组织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党政军警特方面的情报，进行策反工作，以迎接解放。由于我们身处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规定活动的方式以单线联系为主，支部委员会以个别碰头为主。

农工南京市支部重建后，积极开展组织活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谭汉川、倪伟思和我三人，在谭家、倪家、和大同新村九号碰头，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决定问题。

（二）

为了迎接解放军过江，农工组织决定，要我在南京近郊江心洲、八卦洲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农工成员，建立据点。一九四八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找到了住在南京西郊上新河螺丝桥棉花堤的一位老农工党成员肖树茂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四川重庆市北碚镇金刚碑农工党办的民利制革厂当工人），要他

在江心洲农民中间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发展成员，建立农工地下组织，他欣然接受了任务。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到江心洲一带召开三五人的小型谈心会和进行个别访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成员数十人，建立了十来个农工党小组。另外，我还多次由肖树茂叶世明陪同到八卦洲去开展活动，通过叶世明在八卦洲也逐步发展了一些农工成员。在上新河和燕子矶一带，我们还吸收了少数要求投靠人民的国民党的军警人员参加农工党。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上述地方共联系发展了农工成员近两百人。在发展成员中，我们有意识地吸收了一些船工加入农工组织，以便解放军过江时派船接应。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当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南京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二十三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我们在江心洲八卦洲一带的农工成员，虽用不着用民船接应解放军过江，但当时在协助解放军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国家财产，以及协助解放军搜缴国民党溃散部队枪枝弹药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南京城解放后几天，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新河时，农工成员将保存和收缴的物资与武器都交了解放军部队，拿到了收条。

南京解放后，农工中央派季方同志来南京整理党务，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并建立了西郊农工党总支部，以肖树茂同志为总负责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农工中央举行全国五干会议，决定将农工组织中属工人农民的成员，分别交给工会及农会，农工组织不再联系了。

(三)

一九四八年秋天，吴子培同志从安徽屯溪县专程来南京找我。吴子培同志是我父亲青年时代在安徽省桐城县中学读书时

的同班同学，解放前曾任皖南“贵徽”师管区司令，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子培一九四六年曾到南京找过我父亲，谈到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要求参加反蒋民主活动。我的父亲曾对他说：“我的儿子章师明现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将来你可以找他，要他设法介绍你参加农工民主党地下组织，你可以在皖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我一九四七年十月离开上海市时，我父亲对我说：

“我有一个小同乡，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叫吴子培，此人虽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官，但一直不被重用，为人较忠厚，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满，想在政治上找一个出路，将来他如果去南京找你，你可以接待他，和他谈谈，如果他要求参加农工民主党，你可以当介绍人，并要他回屯溪一带发展组织，在国民党军队搞点策反工作。”由于我父亲的关照，所以我把吴子培同志的情况向农工南京地下组织汇报后，就介绍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不久，农工民主党华东局的虞健同志来南京时，我又向他汇报了吴子培的详细情况，并研究确定委派吴子培为农工民主党皖南地区特派员，负责在屯溪一带领导农工地下组织活动，接受我的具体指导，吴子培同志回屯溪以后，在一九四八年冬及一九四九年春，积极开展了民主革命活动，发展了一批农工地下成员，在屯溪一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进行策反工作，他还委派了一位名叫许致中的为农工党屯溪地下组织总干事。这里值得叙述的一件事就是。皖南解放后，吴子培和许致中同志到南京，向我谈了他们如何策动当时国民党屯溪保安司令方师岳起义一事。据许致中同志说，屯溪解放时，他曾到屯溪城里与方师岳接触，说服动员他率部投向人民，方师岳眼见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当即表示愿意起义，和平解放屯溪，约定当人民解放军向屯溪县城挺进时，以摇旗

为标志，欢迎解放军进城。许致中与方师岳谈话以后，立即找到已渡江的解放军某部前进指挥所，将方师岳准备起义的情况作了汇报。但因接谈的同志未及时向上级汇报，而部队又快速前进，致部队到达屯溪时，将放下武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方师岳作为战场俘虏抓了起来。解放以后，经过了解审查，最后按政策定方师岳为起义人员。

(四)

一九四八年冬天，吴子培同志从皖南来南京找我，谈到他有一个儿子叫吴钟祺，是黄埔军校十八期炮兵科毕业生，现在国民党江阴要塞黄山炮兵总台第六台任上尉台长。吴子培老先生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要亮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即将彻底完蛋了。我的儿子还很年轻，我不想让他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你可要为我的孩子在政治上找个出路啊！你能不能介绍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参加革命活动。我的儿子是炮兵台长，将来解放大军打过江时，他可以率部起义投靠人民。”当时我有点犹豫，不敢贸然表态。因为他的儿子是国民党现役军人，才二十几岁就当上了上尉台长，政治思想状况到底如何，摸不着底，因此我就推脱说：“你的孩子不在南京地区，我们不好联系，以后有机会再讲吧！”他觉察到我有所顾虑，便诚恳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和你父亲是中学同学，我不会坑害你的，我的儿子对我很孝顺，是听我的话的，在我未找你之前，我们父子二人已谈过了，吴钟祺是想投靠人民，争取有个光明的前途的。”我听他讲得很诚恳，就答应可以考虑向农工党地下组织反映，并要他将他的儿子在江阴的地址写给我，我还对他说：“以后的事你可以不管了，如农

工党组织同意，由我们派人去江阴要塞和吴钟祺联系，你可以立即写信告诉他说，不久南京章师明可能要介绍一个朋友去江阴拜访他。”

江阴要塞黄山炮台隶属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是长江江防第一线。黄山炮台为国民党江防要塞主炮兵阵地。黄山江面最狭处只二千三百米，当时克虏伯十五公分野战重榴弹炮射程三十华里，国民党军队自恃可以用大小火炮封锁长江，可以阻止百万雄师过大江。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长江。我想如能争取到吴钟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掉转炮口，轰击江北国民党军队桥头堡阵地，掩护解放军过长江，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和吴子培老先生谈话后，我即将情况向倪伟思同志作了汇报。倪听了认为很重要，即向上海农工华东局组织请示汇报，并建议派人去江阴与吴钟祺接头，不久，农工华东局派上海市农工地下成员周公南同志到江阴与吴钟祺联系，并告诉他：“章师明同志已同意介绍你加入农工民主党，农工组织已批准，由上海农工组织与你单线联系，并要你很好隐蔽下来，在国民党官兵中进行工作，待解放军过江时率部起义，为人民立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过江向江南挺进时，吴钟祺同志就在中共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的起义斗争中投向了人民，为人民立了功。解放后，吴钟祺同志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他现在是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秘书处副处长、市农工民主党委员，他的几个孩子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有的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家人过得美满幸福。他的父亲吴子培老同志解放后到了北京，曾任中建工部下属某砖瓷厂厂长，退休后，于一九六一年病逝南京。

(五)

一九四九年年初，农工民主党一位老成员李湘若同志从安徽芜湖市来找我，说有一个人名叫操竹友的，现在安徽省当涂县任县长，过去参加过民主活动，和他关系较深，如果我们能争取操加入农工民主党，进行反蒋活动，将来配合人民解放军过江，会有所帮助。当涂县紧靠长江南岸，距离南京很近，地势很好，如掌握在我们手里，解放军从那里过江，就可以减少阻力，方便得多了。李湘若要我同他一道去当涂走一趟，争取操竹友和我们一同干。我说：“可以，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都应当大胆的干。”当即，我与李湘若同志一同乘车去当涂县政府找操竹友，谁知他见我们两人胆敢到县衙门会他，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他说：“此地是国民党江防要地，军警特很多，谈话很不方便，对你们也不安全，我们马上走吧！”说完，他即用公事车载我们去芜湖他家。这天晚上，我们三人谈了几个小时，他虽认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投向人民才有出路，但又讲：“要活动，条件还不成熟，困难很多，是不是以后再说吧！”同时表示他不能马上参加农工民主党。我们看他胆子太小，没下决心，还留恋国民党县太爷这个官位，和他讲了一些道理后就告辞。后来听说此人在解放大军过江前夕，曾被调到安徽省青阳县当县长，青阳县解放时，他逃跑了。

(六)

记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有一天，许耀洲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叫刘东雄，是国民党一个地方团队司令，驻扎在安徽省桐

城县枞阳镇，官兵共有几百人，沿长江一带布防，可以争取他投向人民，将来迎接解放军过江。我听后认为刘东雄是一个很重要的策反对象，于是立即和倪伟思同志联系，要他向上级组织请示。很快，虞键同志从上海来到南京对我说：“已与有关方面研究过，同意你进行工作。”还说：“如果刘东雄愿意投靠人民，为人民解放事业出力，还可以给他一个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桐城县枞阳镇沿江纵队，委任刘东雄为司令员，要他在解放军过江时，配合行动。”在得到组织同意后，我先请许耀洲先生去枞阳与刘东雄接触，试探他的态度。许去后回南京告诉我，刘东雄愿意投向人民，但要和农工民主党南京组织负责人当面谈一次才放心，他才能最后确定。我与倪伟思同志研究后，即由许耀洲的侄儿、农工地下成员许玉龙同志陪同前往枞阳镇与刘东雄见面。到达当晚，刘请我们吃饭，备了很多酒菜，我没有饮酒，推脱说不会喝，实际上怕饮了酒，会谈出差错。饭后，我们在他的团部楼上交谈了三个小时，把当时的形势，党的政策以及今后的出路等问题，都详尽地同他讲了。刘东雄开始也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长江并非天险，江南以及全中国不久会解放，表示投靠人民，率部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过江。但谈到最后，他却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番号，要我介绍他加入李济深先生领导的民主联军，意思是想搞第三武装。我即说：“据我所知，李济深先生也在进行反蒋民主活动，我不知道有什么民主联军，无从介绍。”经再三开导，仍无转变。我见他没有诚意起义，就说：“你再想想吧！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人心难测，恐遭暗害，我于次日清晨离开，借机回桐城县东乡方家仓我的老家，看望我十几年未见的老母。在家住了两夜，我就前往安庆农工民主党地下成员章惠民等人处，告与刘东雄接触的情况，要他们有机会再对

刘东雄进行工作。在安庆停留两天，交换如何进一步开展安庆农工地下组织活动问题后，就返回南京。由于刘东雄执迷不悟，拒绝人民，所率部队被我解放军击溃，他只身逃出枞阳，后听说去台湾了。

(七)

还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就是南京农工地下组织如何争取和迫使国民党中校军统特务直属京二组组长关坤后弃暗投明的。

记得在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刚来南京不久的倪伟思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我们南京农工组织内部发现了一个混入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农工组织有一个同志有一天去看关坤后，在关的床底下发现了军统内部使用的秘密稿纸，后来又在关的表兄（也是军统特务）那里，了解到关坤后曾得过“甲级报奖金”（甲级报是重要情报，送蒋介石亲自拆阅），蒋介石还亲自召见过关坤后。

关坤后于一九三〇年在北京由万鸿年介绍加入农工党的（当时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农工党内，他曾任总务干事，组织干事，青年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时期的日伪统治区，关曾在南京私立南方大学任注册组主任兼代教导主任，还在汪伪考试院任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于一九四六年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在保密局任党政组通讯员、大学站直属员并兼特务办的边声通讯社、公论通讯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保密局又委派关为南京潜伏特务，任直属第二组组长，了解掌握国民党反动派逃台后的潜伏南京的特务动态。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农工组织如何办？当时以农工

华东局特派员身份来南京工作的倪伟思同志，当即返回上海向虞键同志作汇报。不久，虞键和倪伟思同志来南京对农工南京地下组织进行改组，重建市支部。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迫使关坤后这个特务为我所用。根据关当时的情况，支部认为争取他转变有可能。一是当时革命形势大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关坤后拖着一家老小，不能不有所考虑。二是关坤后是一个没落的满族镶黄旗贵族，汪伪时期在南方大学教过书，挑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有他当特务的凶恶一面，也有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三是他充当军统特务，混入农工组织已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破坏活动。

原则确定后，覃汉川和倪伟思等同志便约关坤后谈话，讲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向他指出：只有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才有出路。在形势所迫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他表示愿意投向人民，立功赎罪。因此农工组织当即规定：1. 关坤后今后必须毫无保留地将军统和他本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包括所见所闻）及时地如实地向组织汇报请示，不得有任何隐瞒；2. 指定介绍关坤后加入农工党的朱静芳同志为联络员，负责与关坤后联系；3. 关坤后所报送的情报，由倪伟思同志转送给中共领导的有关方面。

在南京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任务，要给关坤后一座电台，叫他潜伏下来，在南京解放后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关提升为“潜京二组”上校组长。关立即将军统布置的潜伏情况、人员名单、与台湾联系的密码、办法和呼号汇报给农工组织。对汇报的这一情况，农工组织当即作了研究，决定要关接下这座电台。因为当时南京即将解放，我们要加强对敌工作，加紧收集情报，配合解放大军胜利渡江，此时更需要关发挥更多的作用。后来关坤后向农工组织提供了许多

重要情报，如毛人凤密令关追踪中共中央委员曾山同志的手谕，“潜京二组”特务电台的密码，以及军统少将特务“潜京一组”组长荆有麟的活动情况等。农工组织得到这些重要情报后，立即转送给中共联络员。关除提供情报外，还将军统局发给“潜京二组”的“应变费”的大部分交给农工组织，作为对组织的贡献。计有银元壹百枚，大米二十担。这对帮助农工一部分地下同志度过生活难关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得到解放。不久，农工组织就将关坤后和他的那部电台一并移交给南京市军管会。农工组织争取和迫使关坤后弃暗投明的工作到此结束。

解放前参加民盟南京市地方组织 活动的一些回忆

李秉祥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从重庆回到南京。这时，我在国民党政府社会部所办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社任编辑。

我于一九四五年冬在重庆参加了民盟。回南京几天以后，即和当时担任民盟南京市支部筹委会组织工作的樊光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和他是在重庆参加民盟活动时认识的。他和我见面以后，向我概略地介绍了民盟南京支部筹委会几个月以来的主要情况。

樊光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回到南京的。四月间，民盟中央决议，成立总部迁京委员会。陶行知同志为主任委员，辛志超、叶笃义、罗子为、罗任一等四位同志为委员。迁京委员会除负责总部迁京事宜外，并兼负筹建南京市支部任务。

辛志超、叶笃义、罗任一等三位同志于五月三日到南京。五月九日，陶行知同志由沪来京，主持了迁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破坏，这次会是在玄武湖一个小游船中开的。除四位委员都参加外，还邀请了南京的盟员戴旭初等三位同志参加。罗子为同志留在重庆主持《民主报》经理部工作，未参加。会议决定，由到会的七位同志组成临时